

跨族群、跨部門合作與賦權： 屏東泰武鄉災後重建記錄之個案分析*

洪貞玲**

摘要

本研究回顧莫拉克風災後的排灣族部落重建記錄工作。這場由不同原、漢團體所執行的跨部門合作計畫，回應社區媒介意理，以部落利益優先，讓弱勢者發聲，留下網路及紙本的災後重建記錄，彌補主流媒體報導之不足。透過跨部門合作及參與賦權理論的視野，研究發現，災後記錄的參與者，透過參與而學習，有助於提升個人能力，增進族群認同，反思及促進所屬社群的利益。原漢族群之間的合作，也有助於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去除刻板印象，開啟更多溝通對話的機會。然而，部落內部並非均質組成，部落成員或組織之間存在權力與能力落差、資訊落差，也造成參與動能的落差，如何在部落內部擴大參與，並延續跨部門合作的賦權結果及其影響層面，值得注意。

關鍵詞：災難傳播、社區媒介、莫拉克颱風、跨文化傳播、跨部門合作、賦權

* 本研究係為兩項計畫之成果，包括科技部（原國科會）補助「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之人文與社會發展子計畫」（99-2631-H-002-036-）及紅十字會補助「屏東原住民部落的災難重建及文化記錄」。莫拉克災後重建過程中，屏東泰武國小及泰武鄉居民展現堅韌的生命力與文化精神，以及台大新聞所參與師生長期努力、保留珍貴記錄，以供社會鑑往知來，特此誌謝。

** 洪貞玲為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Email: clhung@ntu.edu.tw。通訊作者為洪貞玲，Email: clhung@ntu.edu.tw。

投稿日期：2013/12/10；通過日期：2014/12/25

壹、前言

台北到屏東泰武，不只是一張高鐵票起站到終點的距離；我猜想，更是學院漢人孩子與排灣文化的距離；也是我們安逸生活與流離失所者的距離。

——梁玉芳，2011：186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諸多原住民部落受災並面臨遷村的抉擇。颱風帶來刷新歷史記錄的雨量，引發嚴重水患，造成台南、高雄、屏東及台東等縣重大災情，交通中斷、土石流災害頻傳下，計有699人死亡或失蹤，1,764棟房屋毀損，經濟損失近2,000億元。立法院通過重建特別預算總計1,165.08億元，進行災後重建（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3）。

面對這場重大災難，主流媒體高度關注、大量報導，網路也在災難發生的第一時刻發揮傳遞資訊、協助救災等功能。然而，災後不久，災區的重建工作正筆路藍縷，災民還在重建家園或是遷村的兩難中困頓，媒體的目光已然轉往別處，輿論也就慢慢淡去災區的訊息。

主流媒體離去之後，仍有很多民間組織留在災區，協助災後重建工作。為理解災區原住民如何面對災難、如何重建家園，以T大為主的本計畫團隊開始為期兩年的災區記錄工作。莫拉克颱風來襲前，T大團隊已經進行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數位典藏計畫，記錄部落的文化、節慶活動，因此和部落文史工作者、木雕師、泰武國小老師都有往來和合作。這場颱風迫使泰武鄉成為災區之一，面臨安置、遷村的命運；也讓T大團隊執行的部落文化典藏計畫，轉型成為災後重建記錄。

這個轉型，彰顯了以數位科技進行典藏的價值，不只局限於文化傳統或歷史文物，更應該面對當前社會變遷，及時進行災後記錄，回應部落族人的需求。從在地需求出發，服務在地利益，符合社區媒介意理。從此，在災後重建的路途上，開啟了T大團隊與屏東泰武部落的跨族群、跨部門合作。

過往文獻指出，災難之後的社區媒介，有助於弱勢者發聲、培力，記錄社區議題、培養社區認同，進行有利於居民的社區營造（孫曼蘋，2001.01；蔡鶯鶯，2010）。然而，並非每個災區都有條件自行重建，

若能有外來團體的支持和合作，更有幫助。跨部門協力，能夠截長補短、相互培力，但是也因為參與者眾，面對文化差異，增加溝通成本（Babiak & Thibault, 2009；Harding, 1990；Wondolleck & Yaffee, 2000）。如何取其優勢、克服挑戰，促成參與、賦權、發聲、對話，完成災後記錄，值得分析。

因此，本文作者在參與災區記錄計畫之後，回顧泰武鄉災區重建記錄的經驗，從災難傳播、社區媒介、跨部門合作、參與賦權的文獻出發，檢視跨族群、跨部門合作的過程，以及災區重建記錄所帶來的影響。

貳、災區記錄的理論基礎

原住民部落在八八風災中受創、遷移，然而，他們卻少有資源為自己發聲。一方面，他們是災民，苦於家園殘破，重建工作漫長；另一方面，他們原是台灣社會的弱勢族群，社會經濟及傳播資源極端因乏。此時，若無外來的力量協助或是社區自主發聲，原住民的需要和想法，難以被聽見。由此顯見跨部門合作參與的重要與急迫。

早期研究指出，媒體對原住民多為刻板印象與負面報導，使得一般人對原住民產生誤解，甚至連原住民本身對自己的文化都不是很瞭解（王嵩音，1998；黃威葳，1995），在主流商業機制下，與原住民有關的廣播與電視節目量亦不足（陳清河，2004；劉幼琄，1998），因此，以原住民為主體的記錄內容，難以在主流媒體中被正確地呈現。2004年，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正式成立，原住民發聲、母語傳承及文化復振，才有更有力的管道。原民台新聞之研究發現，族群媒體的出現，確實有扭轉原住民資訊弱勢、詮釋權旁落的功能（鐘嘉順，2008）。

原民台在災後大幅報導原住民災區情形，但作為設置在台北都會的中心化的族群媒體，它能夠深入災區長期報導的資源必然有限。尤其災難過後，主流媒體或族群媒體都無法駐守災區，持續報導。若無其他管道能真實反映原住民族的災後處境，這些災後重建經驗將付諸闕如，不僅無法讓原住民災民發聲，也難以留下整體社會可供參考的記錄。

因此，T大團隊延續佳興文化典藏的核心價值，以部落參與為原

則，奠基於社區媒介的重要意理。社區媒介不同於主流的大眾傳播，係以社區為單位，報導社區事務、強調社區觀點與利益，透過原住民社區的參與，呈現在地觀點的災難記錄，也希望這個過程可以促進對話、促成賦權的結果。尤其此記錄是由跨越原漢不同團體之間的合作，更可看出弱勢族群如何與外界合作，展開重建並追求社區利益。

以下，本論文檢視災難傳播及社區媒介、跨部門合作、跨文化溝通及參與賦權的意理和價值，以提供分析此災區記錄的重要概念及架構。

一、災難與社區傳播

台灣長期受到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侵擾，災難報導備受關注。學者指出，災難時期媒體傳遞資訊，可滿足閱聽人的需求，並有助於舒緩因災難產生的壓力，但資訊的深度廣度明顯不足（臧國仁、鍾蔚文，2000；蘇蘅，2000）。國外災難新聞的研究也指出，媒體在報導災難時，往往會有更強的立場涉入，表達對災難的傷痛並譴責政府單位救災不力（Hollings, 2010）；然而，急於傳遞災難資訊時，媒體報導的正確性也堪憂（Negra, 2010；Perkins & Izard, 2010）。

媒體報導災難事件的缺失，在八八風災中也一再出現。電視新聞往往要求畫面，戲劇化的呈現災難的驚悚畫面，並訴諸災難的悲情。媒體一方面有固定框架報導災難，另一方面也主觀建構報導模式，強化其政治立場。因此，反而引發諸多災難效應，例如對災民造成二度傷害、重視明星災區而忽略其他地區、錯誤資訊誤導救災，並強化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林照真，2013）。

四大報報導也出現偏好受難者聳動故事的趨勢，同時依賴官方資訊、忽視災民意見、疏於分析和批判政府政策之現象。以時間進展來看，報導多集中在「災難擴大時期」，但在「災難發生前」與「後續重建」階段，報導量卻偏低，顯示報紙並未盡到事前警示的社會責任，災難過後也忽略了重建期的追蹤（陳佳君、陳寧、林巧璉與蔡紀眉，2010.07）。

因為主流媒體快速遺忘災區，造成資訊真空，災區草根發動的社區媒介，填補了資訊的不足。我國九二一地震後，災區相繼出現社區報紙，這些報紙傳播資訊，也反映社區需求、讓災民充分發聲，更是為社區爭取重建資源的重要窗口，被定位是「家園重建的一環」（孫曼蘋，2011）。

研究指出，這些社區媒介建立了一種另類（alternative）的媒介與社區互動模式。災區社區媒介最大特色是「在地人參與」、「從在地發聲」。參與者從「做中學」的過程中，習得媒介產製的能力，激發、強化其社區參與的權力及能力，進而改變參與者個人、人際與社區關係，也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社會（孫曼蘋，2001.01）。

根據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CRIS）的定義，社區媒介提供了以營利為導向的商業媒體之外的關鍵替代選擇。

社區媒介受社會目標所引導，而非出於私人利益動機。社區媒介培力群眾，而非把他們當做被動的消費者；社區媒介滋養在地知識，而非用標準的解決方案來取代。社區媒介的擁有及控制，根植於社區需要並為社區負責。社區媒介致力於人權、社會公平、環境及永續發展。（CRIS, 2002）

社區媒介自 1970 年代興起以來，引發學界的關注。Berrigan（1979）指出，社區媒介，不應只是探討特定媒介的節目安排、閱聽眾興趣等議題，社區媒介是由社區選擇使用、社區居民可以接近使用，同時社區居民可以參與規劃與製作。Hollander & Stapper（1992）認為，社區傳播是小範圍的公共傳播、雙向傳播，參與傳播者同時扮演傳送和接收資訊的角色，打破大眾傳播單向而線性的操作，更彰顯社區傳播不同於大眾傳播的特質。

一言以蔽之，社區媒介整合進社區生活的實踐。他們提供公共參與的工具並且捍衛文化多樣性。社區媒介的內容包含政治經濟新聞可以促成社區對話，也包含社區及個人訊息的各種資訊。尤其重要者，透過近用相關傳播的生產及消費，社區媒介形成了社區賦權的集體平台（Fuller, 2007）。因此，本研究採取社區媒介的概念，其在有限的涵蓋及觸及範圍，運用在地的資源與知識，反映社區需要及利益，內容以支持社區發展為主（Maslog, Navarro, Tabing, & Teodoro, 1997: 3, as cited in Fuller, 2007: 3）。更重要的是，社區媒介有賴社區的參與，促成賦權。

九二一災區媒體的研究發現，社區報的產製和發行，凝聚社區參與，形成了培力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個人層次的改變：居民近用災區社區報、增強認同、培訓社區種子，居民培力；社區組織的改變：建構

社區報與社區組織的互動關係；社區次系統間的橫向連結，增進社區內部與外部組織的互動連結等。可貴的是，社區報促成社區對話及社區認同；行動者則透過辦報實踐社區關懷的公共理念（蔡鶯鶯，2010）。

一份對於《員林鄉親報》的分析也支持上述觀點。員林因為不是「明星災區」而遭到忽略，卻也因此激發社區自主發聲的需求。定期出刊的《員林鄉親報》，搭起社區內外溝通之橋，成為整合地方資源的平台。社區報參與者熟悉傳播技能、媒體公關，連結社區，在產製、行動過程中，賦權、改進集體生活（孫曼蘋，2011）。

社區自主記錄，成為災民發聲的契機。相關研究也展現了社區媒介經驗對於參與者賦權的影響。也因此，援引社區媒介的概念，讓災區民眾參與重建記錄，將可彌補主流媒體的不足，也能透過參與創造賦權的結果。泰武鄉災區紀錄計畫，係以原住民部落為報導主體，並鼓勵部落人士參與，透過網路或紙本媒材為部落發聲，符合社區媒介之特質。然而，相關研究聚焦於社區內部的改變，對於部份由外來團體與社區合作的個案缺乏關注，也因此無法提供跨部門合作的經驗。以下引入跨部門合作的文獻，有助於檢視災區和外部人士合作的過程和結果。

二、跨部門合作及賦權

如同前述，本研究所涉災區，係為災難和族群的雙重弱勢，能夠依賴自身力量進行災後重建、記錄的實為少數。從發展理論以及相關經驗來看，促成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力合作，並創造一套弱勢者參與的機制，方有助於促成弱勢者及其社群的發展（Brown & Ashman, 1996）。

跨部門合作的優點是可以截長補短，參與者都是獨立的個體或組織，具有特定的目標與資源，可決定何種資源可以和合作夥伴交換，也因此決定其互動關係（Babiak & Thibault, 2009）。在合作過程中，參與者透過學習並確認自身利益，並自主決定對其發展最有利的方案。參與合作，也有助於學習和賦權。

跨部門合作也會面臨諸多挑戰，包括不同的目標、任務、不足的獎勵或合作機會、不夠彈性的政策和合作程序、拮据的資源、不信任感、合夥人間對彼此不當的態度、不同的組織型態與文化、未能提供合作夥伴足夠的支持等（Wondolleck & Yaffee, 2000）。

也因此，跨部門參與的過程中，參與者應注意目標、價值、溝通、學習等面向，以建立成功的合作關係，包括建立明確的目的、一致的策略、整合資源創造價值；合作夥伴間要有良好的信任和溝通、參與者能持續地學習和成長、遇到困難時能共同解決。

整體而言，跨部門合作因為涉及不同團體、組織，優點在於可以截長補短，並相互學習。但也必須面對合作夥伴之間的異質性，其挑戰會出現在團體之間的差異以及溝通成本，因此必須不斷確認目標和策略、保持開放並持續溝通，達到合作團體之間的既定目標和最大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跨部門合作通常處理不同組織間的關係，較少碰觸社會脈絡或文化情境等議題。以本個案而言，因涉及原漢族群之間的合作，可以用跨文化傳播的概念來補充。

人對於世界或其他人的感知，深刻地受到他／她所處文化系統的左右。不同文化會形成各自的文化認知，例如在社交禮儀、文化價值、宗教信仰等面向。因此，跨文化傳播，就必須面對這些文化認知的差異（Samovar & Porter, 2004，轉引自 Li & Patel, 2011: 16-17）。

文化間的差異或是衝突，主要包括文化情境、語言差異、思想型態等（陳國明，2003：342-353）。此外，常見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群體，對於別的群體存在刻板印象或偏見，因此影響跨文化認知（陳國明，2003：59-103；Li & Patel, 2011: 29-35）。尤其，主流群體對於弱勢群體，例如女性、少數種族等等，存在負面建構的刻板印象，為文化間的溝通帶來負面影響（Patel, Li, & Sooknanan, 2011）。

如何解決跨文化衝突？不同文化的互動者，應顧及雙方需求，發展出一套雙方可以同意與互利的方法，適度地解決問題，達到雙贏的結果（陳國明，2003：364-365）。更具體地說，跨文化協商中，解說和翻譯十分重要，可協助雙方彼此瞭解。此外，尊重個人及文化的獨特性、關注訊息、瞭解文化所形塑的信仰系統和價值觀、避免以自身文化論斷他人文化等，在跨文化互動中非常重要（Li & Patel, 2011: 16-17）。良好的跨文化互動，最終方能增進瞭解、創造雙方利益。

結合跨部門合作、跨文化傳播與社區媒介的論述，可作為八八風災後，原住民災區與外來團體合作進行災區記錄的基礎。也就是說，災區紀錄是以原住民部落為主體、社區利益為依歸的社區傳播，但本案同時需要外來者的協力與參與。因此，分析重點在於跨部門合作的災區記錄，需要截長補短，發揮不同參與者的優勢；在充分溝通下，

採取一致的策略，相互支持及學習，完成符合社區利益的共同目的。而參與者透過參與災區記錄，應能形成賦權的效果，對其個人或社區造成影響。

關於社區媒介及參與賦權的影響，前一節所述九二一地震後的社區媒介研究已經印證。此處，進一步闡述賦權之內涵，將有助於我們理解賦權的多方面向。Adams（1996）定義賦權是讓個人、團體或社區參與及決策，得以自助助人，改善其生活處境。賦權是一種變遷歷程，協助人與社區運用自有能量，來對應個人或集體困境，進而提升整體生活福祉（羅秀華，2003）。

Zimmerman（2000）認為，參與賦權是一種個人到集體改變的過程和結果。透過參與，個人對於自己試圖完成的事情產生信心，並可共享權力、資源與決策等，因而擴大到組織、社區，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追求集體的發展和利益。參與賦權，因此是從個人心理賦權到社區賦權，形成一個由心理、組織與社區依次組成的「賦權金字塔」。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也提出類似主張，指出賦權可在個人（心理與行為）、組織（資源動員和參與機會）和社區（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變遷）三個層面建構，並且讓人們有穩定的管道，可以運用權力來介入決策或採取行動。也有學者指出，賦權產生三種層面的結果，包括個人心理社會層次：增強個人面對問題以及處理問題的承諾；生活技能層次：改善能夠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條件；制度及社區發展層次：參與的結果最終能影響個人或是社區發展（Narayan, 2006: 5, as cited in Tufte & Mefalopoulos, 2009: 2-3）。

綜合上述討論，參與賦權的結果，在個人層次及集體層次都會造成影響，個人層次，涵蓋主觀的心理與實質的知能培養；集體層次，則涵蓋組織或社區的改變。因此，對於參與者個人，以至於組織、社區的發展，皆有助益。

泰武鄉災後重建記錄計畫，係由 T 大團隊與泰武國小、災區居民合作進行，過程中持續溝通，並輔以培訓，讓參與者習得相關能力，記錄災區重建。透過跨部門合作、參與賦權的理論視角，有助於剖析計畫合作的動態特質以及對於參與者的改變，在反思這項災後重建記錄計畫的同時，也能對後續相關研究提供建議。

參、研究方法

本文透過災難傳播、社區媒介的文獻，理解社區傳播對於災難地區弱勢民眾的重要性；並以跨部門合作、跨文化傳播、參與賦權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因此，回顧泰武災後重建記錄計畫，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 一、泰武災後重建記錄的社區傳播過程中，跨部門、跨族群參與者之合作，有何特色？具體而言，跨部門合作有何優點？面臨何種挑戰？
- 二、跨部門、跨族群參與者從災後重建記錄經驗中得到何種賦權的結果？在個人或集體層面的賦權影響為何？

本文所分析之泰武災後記錄計畫為期兩年，主要自 2009 年八八風災之後，至 2011 年風災兩週年書籍出版。T 大團隊係由該校新聞研究所師生所組成，並邀請媒體實務教師協助；災區紀錄的在地合作夥伴，主要為泰武國小與部落人士。

本研究透過第一手的參與觀察所得，同時，取得二手資料，以及訪談參與者，形成本論文主要的分析資料。研究方法及蒐集資料內容如下。

一、參與觀察

研究者在計畫期間數度前往泰武鄉，觀察災區受災情形、中繼遷村、學校遷校、災後重建等情形，並與部落人士互動。在台北，則有實際授課、培訓學生、參與災區田野及報導之討論。針對本研究相關的觀察重點主要為泰武鄉人士與 T 大團隊之間的合作、互動過程，雙方針對執行計畫的相關會議與討論，涉及學校參與的部落重建工作。

二、二手資料

計畫過程中的相關文件，包括培訓課程內容、田野調查記錄、網路新聞報導、災後記錄專書等。

三、訪談

訪談對象主要分為兩類，一為泰武鄉部落人士，一為 T 大計畫團隊，透過雙方核心參與者的意見，瞭解跨部門合作的過程、參與及

賦權的結果。泰武鄉部落人士的訪談，主要在計畫期間 2009 年底至 2010 年之間進行，並於 2014 年進行補訪。T 大團隊學生的訪談，除了計畫中的互動及討論外，主要為 2013 年 11 月進行的團體訪談以及書面訪談。本論文引用的受訪者資料，包括泰武鄉部落文化工作者、學校教師、咖啡農共六名，T 大團隊學生五名。為符合現行研究倫理規範、保護受訪者隱私，訪談資料皆以匿名方式呈現。

訪談問題主要如下：

- (一) 回顧災區紀錄計畫，你所參與的工作以及合作經驗為何？
- (二) 你認為計畫執行過程中的跨部門、原漢之間的合作，有哪些優缺點？面臨甚麼挑戰？你（們）如何克服挑戰？
- (三) 參與此計畫，對你以及你所在的社群有何幫助？造成甚麼改變或是賦權的結果？請就個人層面（心理、知能）及集體層面（組織、社區）的賦權結果分別說明？

訪談採半結構訪談，以上述主要問題為基礎，在訪談進行中，會依據理論架構進一步問子問題，也會因應受訪者的回答再提出深入的問題。

本論文引用的受訪者資料，包括泰武鄉部落文化工作者、學校教師、咖啡農共六名，T 大團隊學生五名。為符合現行研究倫理規範、保護受訪者隱私，訪談資料皆以匿名方式呈現（參見表 1）。

表 1：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	身分特色	訪談時間
甲	排灣文史工作者、族語老師，排灣族，女性。	2010.08.26 面訪
乙	泰武國小教師，主管職，魯凱族，女性。	2010.02.03 面訪 2014.07.10 電訪
丙	泰武國小教師，古謠隊指導老師，排灣族，男性。	2010.09.27 面訪
丁	木雕師，排灣族，男性。	2009.09.17 面訪 2014.07.09 電訪
戊	咖啡農，排灣族，男性。	2009.12.08 面訪
己	泰武國小教師，主管職，排灣族，男性。	2009.09.17 面訪 2014.07.09 電訪
A	T 大學生，現為媒體工作者，漢族，女性。	2013.10.29 面訪
B	T 大學生，現為媒體工作者，漢族，女性。	2013.10.29 書面訪談
C	T 大學生，現為媒體工作者，漢族，男性。	2013.10.29 面訪
D	T 大學生，在學中，漢族，女性。	2013.10.29 面訪
E	T 大學生，已畢業，漢族，女性。	2013.10.29 面訪

肆、屏東泰武鄉災區重建計畫

屏東縣原住民部落，在八八水災中，幸無重大人員傷亡，但豪雨引發之土石流、山崩，造成地景、地貌的劇烈變化，居民災後的經濟、生活方式也出現重大轉變。泰武鄉為排灣族部落，在行政院公布之「莫拉克颱風災害部落原居地安全初評結果」中，泰武鄉泰武村因為嚴重走山，被評定為不安全區域，展開安置與遷居的路程。

災難初期，泰武村與相鄰的來義鄉災民被安置在忠誠營區，等到萬金鄉永久屋完工，泰武村民才結束中繼生活，將新生之地定名為

兩村的人口都不多，佳興村為 410 人，戶數 89 戶；泰武村人口 718 人，戶數 123 戶。與多數原住民部落一樣，由於地理位置孤立、資源缺乏，部落人口外流嚴重，年輕人多遷移至平地工作或就學，留在部落的多為老弱婦孺。^[1]

佳興部落產業道路旁有泰武國小佳興分校，但因就學人口過少而廢校，部落學童轉至泰武村的本校上課。廢棄校舍一度轉型為木雕工作室，供部落的木雕師創作；也曾募集圖書、電腦等資源，將閒置空間改建為部落教室，經營課輔班。八八水災過後，泰武國小數度遷校，原設泰武國小的泰武數位機會中心暫時遷移至佳興分校校舍（洪貞玲，2012：29）。學校在扶輪社的捐助下，興建佳興希望校區，讓流浪的學校師生暫時有棲身之所。最後隨著永久校區成立，2011 年 9 月所有的師生移至平地的萬金鄉吾拉魯滋部落。^[2]

自 2007 年起，T 大數位典藏團隊進入這個大武山下的排灣部落。^[3]佳興部落有豐富的排灣族文化傳統，不論是雕刻、古調歌謠的傳唱、紋樣的保存、刺繡及編織技術等，都仍未失傳，是文化典藏的一個重要據點，與佳興比鄰而居的泰武村，除了排灣文化外，並有泰武國小的數位機會中心做為數位培訓的基地。T 大與部落人士合作，架設排灣原鄉文化典藏網站。風災之前，網站總共收錄了 64 支影片及數位化 1,407 張照片，內容有節慶活動、居民生活照、部落景觀今昔、珍貴的木雕及耆老紋手照片，以及傳唱古謠影片等等（洪貞玲，2012）。

八八風災過後，在既有合作基礎上，T 大團隊和部落人士決定將原本進行的部落文化典藏計畫，轉型成為災後重建記錄，共同面對部落變遷課題，以回應部落族人的需求。這個階段，T 大團隊與泰武國小成為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並依據計畫需要尋找出資、合作對象。為了記錄所需，這項計畫在 T 大研究所及泰武國小兩地開設培訓課程；接著進行田野調查，由災區居民提供資訊和意見，T 大學生記錄、執行。最後，記錄團隊將災後觀察訪談結果寫成災區報導，即時公布在網站上，也規劃出版專書。風災兩週年，泰武國小新校區落成，合作團隊共同發表專書。

伍、跨部門合作與跨文化傳播

本節將解析災區記錄計畫的跨部門合作過程，以回答研究問題一。計畫一開始，由 T 大團隊和泰武鄉確認合作，即著手爭取經費挹注和人才支援，並進行初期的資料蒐集和追蹤報導。接著與泰武國小及部落人士，就課程培訓、田野調查、報導出版等展開合作。最後記錄成果，透過網站、連結其他相關網絡，以及出版專書等方式展現。剖析這個動態過程，可以指出跨部門合作的優點及挑戰。

一、跨部門合作的優點

(一) 截長補短

T 大團隊位於台北，透過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與泰武鄉在地人士已有多年互動，在部落受災後，雙方取得共識，將原本進行的文化典藏轉型為災區記錄。災後重建記錄的主要合作者為 T 大團隊與泰武國小，以兩個單位為核心，往外擴散。資金部份，取得國科會經費補助，並向紅十字會申請專案補助，補足往來於台北屏東的田野經費，並得以擴充計畫人力。專業部份，T 大團隊邀請資深新聞工作者與教師合作，帶領學生進行部落重建的即時與深度報導。在地的泰武國小，學校師生分享重建經驗、原鄉知識，也協助 T 大團隊在部落的採訪以及在地的培訓計畫等。

易言之，災區記錄的跨部門合作，包括學術單位、災區居民、政府部門及民間社福團體。這些部門，各有不同的組成、特性及文化，

也代表不同的資源和條件，可以截長補短，滿足這項計畫在資金、人力以及專業上的需求。

對災區而言，他們意識到發聲權的重要，對於有助於部落發聲的外來團隊，表示歡迎。災區學校雖然是接受協助的一方，但是很清楚其重建需求，展現主體地位。

站在學校的立場，我們是歡迎的，我們不會拒絕幫忙。你們是T大新聞所，所以當初我們一接觸時，我們是高興的，因為我們的問題透過你們，可以被外界知道。你們可以幫助我們。你們握有的資源、發聲權，是當時我們在災難中非常需要的。我們知道我們需要什麼。（訪談部落參與者乙，2014年7月10日）

T大團隊有記錄專業，受到部落的青睞，因此順利展開合作。作為外來的記錄者，可以保持外來者的客觀，避免陷入部落內部的紛擾；另一方面，外來者不瞭解部落，也因此，需要部落人士教授在地知識，才得以正確記錄並深化文化之內涵。

你們是局外人，因為你們不知道部落的事，所以你們可以比較客觀。這是局外人的好處。因為你們不用對我們的人際關係負責，我們是要對我們的人際關係負責。所以文化內的人要對他的人際關係負責，文化外的人可以不用對人際關係負責，所以你沒有壓力，這是一個好處。

缺點當然就是有一些。你對於文化的解讀能力不夠的話，就會有一些誤解，這個部份就是比較不好的部分。就是說可能我們還是要跟老人家對稿，那我們寫完出來的時候還要再去講給老人家聽，是不是跟我們之前講的都一樣？對這些部分可能就需要再去做，這個部份是你們吃虧的，那你們的缺點就是你們一定要我們在身邊才能跟部落的人溝通。（訪談部落參與者甲，2010年8月26日）

（二）持續學習

參與者持續學習，是跨部門合作成功的重要條件，也是賦權的主要基礎（Brown & Ashman, 1996）。計畫執行期間，在 T 大以及泰武國小分別開設培訓課程，讓兩地的參與者接受訓練，學習報導、記錄的能力，可以實際運用於計畫中，有助於計畫成果的品質，也有助於參與者的賦權。

值得一提的是，泰武國小的公民記者培訓，係由該校老師主動要求，希望讓學生習得文字與影像記錄的能力。部落參與者丙很清楚地體認到「文化的東西固然重要，傳統的東西固然要去保存，有一個部分是他其他的能力是要再被提升的」。爭取外部資源為部落及年輕一代培力，一方面顯示部落自主的能動性及參與學習的動力；另一方面也顯示，部落與外界互動後更能運用外界資源為己所用。

我發現到，以前我們的孩子對表達可能就很陌生，或者是說很畏懼，面對鏡頭他們也不夠落落大方，所以想說透過小記者的訓練培訓讓他們能夠更容易去輕易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就是可以勇敢去講話。那第二個我覺得說，讓他很容易去瞭解他發生了甚麼事情，學校發生了甚麼事情，部落發生了甚麼事情，替部落做記錄。（訪談部落參與者丙，2010年9月27日）

T 大學生雖已具備基礎新聞專業訓練，但透過田野工作，更能體驗新聞現場與課堂學習的差別。尤其與災區原住民互動，學習謙卑地理解並欣賞原住民的生活哲學。參與學生反思，誠懇地面對自己年輕、歷練不足：「和五十歲以上農人聊天，很難講上兩句，問題大多出在我身上。年紀太輕，缺乏人生歷練，無法從訪談中追問生活細節。只能依賴田野題綱，拼湊農人面貌。」

然而，體認到自己的不足後，面對部落居民，方能謙虛地體會和學習。

在採訪過程，我學著尊重咖啡，體會生產者的心情。觀察每杯咖啡呈現的表情，是酸是苦、是澀是噙。試了一段時間，我開始以另種角度，理解老農的種植方法。不施肥、不割

草，回歸自然生態環境，或許是原住民的自然倫理。縱使不被學界、業界肯定，卻仍是部落咖啡的「特色」。(郭恆成，2011：56)

培訓課程促成雙方的學習和成長，也具備基礎能力，得以完成記錄工作。此外，遇到困難時時相互協助，也是跨部門合作重要的過程。例如，書籍完成編輯之後，計畫團隊仍苦籌不到足夠印刷經費。最後關頭，泰武國小校長伍麗華承諾尋找經費，促成兩校共同出版重建深度報導專書，並將書籍致贈給部落居民，作為重建紀念。此例顯示，跨部門合作案往往存在變數，合作過程中保持開放，接受參與者的意見，也能提升計畫的成效和貢獻；然而面對困難時，正是考驗參與者互信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有責任、承諾的參與者，能夠共同面對問題，尋找解決之道，顯現其能力的提升，也方能讓合作持續。

二、跨部門傳播的挑戰

(一) 確認目標與策略

災區記錄的跨部門合作歷程，可以看出不同部門截長補短、相互學習的作用。但是，合作必須有明確的目標和一致的策略，也必然是不斷溝通的過程。計劃的參與者，對於透過記錄讓災民發聲、保留重建經驗的計畫目標，有高度共識；對於使用訪談、調查、培訓等方式留下記錄，經過溝通慢慢取得同意。再進入到報導呈現的形式、報導角度，則是不斷協商的結果。

例如，從數位網站到書籍出版，孰優孰劣？雙方有過多次討論。數位典藏有其快速分享、無遠弗屆的優點，但也有侵權、上網門檻等問題。部落人士主張應該出書以保存知識的價值。最後，雙方達成共識，以數位和紙本出版同步進行。

我認為說數位典藏一定要配合書籍……。因為我在網路上，真的會有所限制，沒有電腦的地方或者是沒有網路的地方，或者是說，你想思考的時候。而我認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出書，因為書它有很清楚的權益的保障，而網路就只是一種分享。可是，知識的分享，也是會受到限制，

你們自己也不可能全面性的掛在網上。我覺得出書就是可以保持知識的價值。數位典藏是保證它的傳播率，但是書可以保證它的價值。（訪談部落參與者甲，2010年8月26日）

災區記錄使用的媒介，以網路及書籍兩者為主，係考量合作雙方原本已經使用的媒介，也考量網路資訊發表的即時性與低成本；但是無可否認，部落居民習於使用網路者仍然有限，存在城鄉數位落差的問題，因此，具有紀念價值的書籍出版，成為彌補網路訊息的在地散布及實體保存的不足。誠如文獻指出，社區傳播媒介的選擇不限，以社區需求及在地條件為主要考量（Fuller, 2007）。

報導角度上，原住民族長期受到媒體的污名化、弱勢化報導，因此，他們強調，合作記錄應該翻轉主流對於原住民族的上對下姿態，而是應該站在原住民文化卓越的角度來報導。

有文化性的主觀在裡面，或許在你認識的原住民，你都一直覺得他很可憐，這叫做社會的弱勢團體，所以你會一直覺得他很可憐，所以你這會加速別人認為原住民很可憐。但是我們從來不希望透過報導呈現我們是很可憐的，我們希望透過報導，是希望可以展現在可憐之外的美好之處，我們希望是很陽光的。因為我們又沒有要募款，你沒有需要用的那麼可怕。我們希望是可以站在一個文化卓越分享的立場。（訪談部落參與者甲，2010年8月26日）

最後，泰武災後重建記錄呈現在排灣原鄉網站以及深度報導專書。網站上的風災專題包括遷村、安置、教育、產業及重建，提供文圖並茂的記錄。災難記錄專書分成四個主要篇章，包括(1)泰武國小：記載學校遷移的原由與足跡，以及遷移歷程中師生的努力；(2)泰武遷村：居民面對遷村的考量與掙扎，中繼安置的挑戰與希望；(3)泰武咖啡：部落人士如何重拾祖先荒廢的田園，種出優質的咖啡，帶動觀光和生計發展；(4)排灣文史：專訪木雕師談作品，介紹排灣古調的傳承與創新，以及 vuvu^[4] 紋手的故事。

從災難傳播的角度觀察，以草根社區為主體的災區記錄，不同於主流媒體所建構的災難記憶。主流媒體的災難建構，多數集中於災難

發生當下的恐懼、悲情，聚焦於明星災區，也有泛政治化的現象。而媒體因追求時效不慎造成的資訊錯誤，或對災民的二度傷害，反而是造成另一場災難（林照真，2013）。長期追蹤部落重建的災區記錄，所記錄者即非主流媒體鎖定的明星災區，給予一群原本未受媒體重視的災民發聲機會；雖然也記錄災難創傷，但更深入追蹤災民的感受和意見，災後遷村、遷校的困境，並引導向災後重建與部落自主力量，例如文化傳承和產業發展。在部落人士的參與下，災區記錄並未把災區民眾視為悲情無助的客體，而是重建家園的主體，彰顯社區傳播所強調的社區參與、主體發聲的精神。

（二）面對差異，溝通協商

合作參與者愈龐大、異質性愈高，所需要的溝通成本也愈高（Babiak & Thibault, 2009），因此在計畫中也需要明確定位及分工。例如：國科會及紅十字會係補助單位，考核計畫成果，但不干涉計畫執行過程；T 大團隊與泰武鄉居民為主要合作者，新聞所師生有記錄與報導專業，但泰武鄉居民才是主體，由在地居民表達意見及需求，引導報導主題，並享有成果。

雖然部份學校教師態度開放，歡迎外來團隊進入，但也有教師抱持觀望，對於跨部門合作戒慎恐懼。因為，過往原住民部落與外來團隊合作，可能有被剝奪、不受尊重的經驗，而影響彼此的信任。唯有參與者展現誠意，持續互動，增進彼此瞭解，才能解除心防，讓合作順暢。

T 大團隊進來，一開始我有比較觀望的想法，以為可能只是公部門的計畫，想來瞭解現況，制定政策，天高皇帝遠，跟我們不是那麼相關；可能只是拍個照，就走了。有些團體做物質、金錢上的幫助，發錢之後就離開了；有些做報導，瞭解災後重建安置，也就這樣了。外來團體達到既定目標，很快就離開。但你們這個團隊，接觸時間很長，改變我的想法。你們花很多時間來認識我們，我們也比較瞭解。（訪談部落參與者己，2014 年 7 月 9 日）

又，以災民為主體的重建報導，期待召喚多數部落民眾參與，然而部落處在災後的動盪中，安置遷村就業生活等議題，往往令居民自顧不暇，面對這樣的災後現實，記錄團隊必須保持高度的彈性因應。原本希望透過培訓合作，招募更多部落人士參與記錄，但在部落內部動員能量不足的情形下，也曾造成記錄工作停滯，最後協議由 T 大團隊主責採訪記錄，部落人士參與表達意見和分享經驗。

當然像幾個部落的年輕人，我是覺得他們要起來啦。但是很多東西是很現實啦，就是他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如果這個地方沒有辦法支持他的生活，他反而要花更多時間的話，沒有很多人可以為了文化而持續做努力的啊。……對，所以如果有一個協會，有一個人專門就是去做這樣的事情，也許有可能啦。（訪談部落參與者丙，2010年9月27日）

跨部門合作的異質性高，又面對部落災後的變動，因此需要保持彈性，並充分溝通協商。溝通在記錄計畫中尤其重要，持續的訪談工作累積溝通經驗，溝通的內容作為災後重建的基礎資料，溝通的結果更能加強信任，促成進一步合作。但也無可否認，弱勢社區的參與動能，並非一蹴可幾，需要更多的時間以及在地經營，這點，確實是跨部門合作需要慎重思考並提出有效改善之道的議題。

（三）跨文化傳播的課題

T 大研究所是遠在台北都會的漢人學術團隊，與部落的文化風土民情有相當落差，因此部落人士的參與是計畫得以持續、並取得豐富成果的關鍵。雙方的互動，不只是都會大學與部落學校之間的跨部門合作，也是跨越族群的原漢文化接觸和傳播。依據文獻，跨文化傳播有幾個主要障礙，思維方式、語言差異和刻板印象（陳國明，2003：342-353；Li & Patel, 2011）。這些障礙，在本計畫中也一一出現。

你的邏輯思維表達方式，原住民跟漢人的表達方式、思維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所以當你這樣子講講不通的時候，換另外一種方式說，其實他就懂了。你要用他熟悉的表達方式。（訪談部落參與者丙，2010年9月27日）

面對跨文化傳播的困境，有賴文化中介者居中翻譯和協調，幫助雙方理解和合作（Li & Patel, 2011）。針對耆老的訪問以及古謠的採集，必須使用排灣族語，因此由族語老師陪同並協助現場翻譯；對於排灣文化的認識和介紹，例如木雕發展的歷史、紋手圖騰的意義等，更需要文史工作者進行文化詮釋。

你們遇到最大的艱難會是語言，因為我們在翻譯上會有落差，你想要的東西，表達的不夠好，在轉成族語的時候，老人家沒有辦法知道你要的是什麼，然後我也沒有辦法把它真正想表達的表達出來，所以你們會雞同鴨講。所以我覺得語言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你不能聽見的是第一手的感動，你是經過消化的，如果你遇到一個翻譯，不是像我喜歡七嘴八舌的，講話講很久，就很難理解排灣族文化的精髓。（訪談部落參與者甲，2010年8月26日）

不同文化中，有其特有的儀式與禮俗，若未能入境問俗，易導致衝突（Samovar & Porter, 2004, as cited in Li & Patel, 2011: 16-17）。本研究中漢人不懂原住民的互動禮儀，也曾引發誤會，文史工作者就曾經提醒 T 大學生，耆老在排灣族社會極受尊重，拜訪耆老時應該要準備飲料等小禮物，表示尊重及禮貌；多參與部落活動，融入部落生活。當漢人學生遵從建議，學習如何與耆老互動，因而感受到部落人士的善意和無私分享，讓他們更深入瞭解排灣文化的底蘊，也因此拉近族群之間的距離。

面對部落的耆老我是畢恭畢敬，也很擔心會因為冒冒失失而對他們不禮貌，但是這些我接觸過的老師或是小朋友或是部落裡的所有成員，都是敞開心胸接納我們，也願意分享的。更讓我驚訝的是他們也有教漢人他們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味的藏私或自卑或甚至將我們拒於門外。我覺得在這趟田野中學習是我很大的收穫。（書面訪談 T 大學生 D，2013年10月29日）

本計畫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更能凸顯災區記錄的跨族群特性，漢人學生與部落居民之間，存在著語言、文化上的差異，外來人士進入部落，一定要有部落人士的引介，方得其門而入。原漢互動的過程，建立在合作雙方的互信基礎上，也因為持續溝通而增進瞭解，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瞭解，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磨合與學習。（關於跨文化的相互理解，本文下一節將有更多分析。）

陸、參與賦權的結果及反思

本節分析災後記錄計畫的參與賦權結果，以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泰武災後重建記錄，對於泰武部落以及 T 大團隊的參與者，都產生了個人到集體層次不等的賦權結果，參與促成了個人及社區的改變。

一、災區參與者賦權

災後社區媒介的文獻指出，社區媒介形成社區賦權的平台，因為可以凝聚社區參與，近用傳播工具，形成了個人到集體層次的賦權（孫曼蘋，2011；蔡鶯鶯，2010）。災區紀錄計畫成果，印證了社區媒介及參與賦權的理論。泰武鄉民受災，需要發聲的管道，重建部落。災區紀錄計畫，得以讓部落居民近用傳播工具，表達意見，成為災後重建的行動主體，而非只是接受補助的災民。部落的參與者透過培訓增加傳播技能，強化社群認同，合作過程也增加與外界團體的互動，能夠善用外界資源協助其重建，尤其在學校的努力下，持續進行文化傳承教育。

（一）個人賦權

網路新聞報導以及書籍中，大量使用部落居民的意見，訴說部落重建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出部落人士傳承祖先精神，面對災難的勇氣。個人賦權可從心理及知能兩方面理解：以泰武國小參與者而言，學童參與災後記錄培訓，習得記錄能力，也增強部落記憶與認同；老師在重建過程中，也展現在原鄉傳承文化的決心，以及持續用記錄方式對外發聲。

泰武國小學生的賦權，展現在專書中的攝影作品。例如學生提供

自行拍攝的學校門口因風災而傾斜的照片，並述說他們對學校和部落的感情，讓外界更清楚理解災民在災難中的處境。由學童郡苓拍攝，另兩位學童瑞安、鈺鈴撰文的報導中，述說著部落圖騰及校園記憶，清楚傳達文化認同。

在原來的泰武國小門口，有個又大有美的陶壺，上面刻著百步蛇的圖案，代表著學校的光榮，我們都很愛它、保護它，只要看到它，就會想起從前。希望以後在新的校區，還能看到它，持續象徵我們從山上到山下不變的榮耀。（查慧瑛，2011a：43）

公民小記者的培訓，除了教授攝影、採訪、寫作等技能外，在田野實作中，給予原住民學童更多機會認識部落，重新連結自己的成長記憶與族群認同。參與小記者培訓的 T 大學生觀察指出：

平常小朋友跟部落的分隔感是很大的，因為不太容易看到他們生活在部落的樣子，因為他們都在住宿啊。但是帶他們回到部落的時候，就發現他們跟部落的一些連結性。……尤其是你看到他對部落的一些記憶、一些人與人的關係，就在那個小細節裡面顯露出來。……他會介紹說這個是他的 vuvu 啊、還是誰，誰結婚了，現在住在哪裡，那個表情都不太一樣，所以那種實地的踏查，可能更勝於我們在課堂上教他們那些操作。（訪談 T 大學生 A，2013 年 10 月 29 日）

學童的記錄能力及部落認同，在重建過程中得到培訓和激發，也有賴於學校老師的信念和支持。學校老師平日就透過上課，傳承部落文化，讓孩子熟悉自己的家園，然而，遷村、遷校，喚起教師高度的憂慮，更加堅決把學校留在山上的決心。

我覺得遷村以後很多東西會改變，部落的觀念、思維、心態，新的地方應該要有新的制度，但是那個傳統的東西不可能丟掉啦，是因為有那個東西我們才驕傲啊！不然現在有什麼條件跟人家談說我們原住民有什麼東西，這個是人家拿大姆指

可以讚美的，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老人家留下那些東西，不能丟啦！（訪談部落參與者丁，2009年9月17日）

即便是有一天我們真的到台糖的那塊土地，泰武國小在那邊，但是如果我們做了某些事，（山上）這間學校還是可以成為我們的分校或假日學校，其實在台糖那塊地，平地喔，要做很多事是不容易做的，一定要在佳興或泰武那樣的環境下，我們才有辦法去做一些有關原住民的事情，到平地去做這些事不倫不類啊。（訪談部落參與者乙，2010年2月3日）

泰武國小遷校過程備極艱辛，展現其處理問題的承諾與意志力。經歷過風災遷村遷校，與外來團體持續合作，給予泰武國小師生有更大的自信心，可以面對未來，開展更多計畫。

如果把每個重要的肯定當做一個階段，從一開始要辦這些，老師你們來，外部單位進來，我們在那過程中獲得、累積的能量，能給我們下一階段工作很正面的幫助。它會 push 我們可以再做更多，在什麼地方再多一點努力。（訪談部落參與者己，2014年7月9日）

泰武國小內部，很多老師本來的使命感很清楚，有些人原本對於原鄉的使命或許沒有那麼清楚，但是大家會互相感染、互相影響。……經過風災之後，一路走來，我們看到很多事情，是很有可能，勇氣就愈來愈大。（訪談部落參與者乙，2014年7月10日）

（二）集體賦權

重建過程中，部落增加與外界的互動，增加連結組織與網絡的能力，也從經驗中學習，採取更多行動促進部落利益。在地學校汲取災後重建時外來團體的專業能力，納為己用。即使外來團隊離開，學校老師及部落人士還是可以持續進行文化復振與人才培訓，持續透過

行動改變部落，透過教育傳承文化，例如學校持續培訓古謠隊、訓練學生介紹部落及文化，擔起為部落做準備的工作。

我們去拍文化重建的時候，部落的理事長、主席都在提，我希望某單位幫我做什麼，某單位一直幫我們做什麼，然後我們需要什麼協助，後來我站起來我就說，當然現階段我們要推文化產業，推任何的東西都是需要人家幫忙，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就是我們是不是也開始替部落準備，準備什麼呢？……就是文化產業那麼重要，或是整個咖啡產業那麼重要，我說你們不鼓勵你們的孩子幹嘛？你們去讀農經產業啊、行銷管理啊，這些人慢慢在長大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缺人才嗎？而且這些人才就是你在地部落的人才，所以我就是說很多東西我們要替部落準備，那雖然那個距離還滿遙遠的，但是這一步你只要踏出去了就是你的。（訪談部落參與者丙，2010年9月27日）

出版專書之後，T大團隊與泰武國小的合作告一段落而離開。但是專書合作的經驗，讓泰武國小意識到出版的效益，也習得出版的經驗，因此，自己將經驗傳承下來，陸續出版繪本、教材等專書。因此，泰武國小已有能力自行傳承出版經驗，展現組織層面的集體賦權。

出版專書之後，學校在之後陸續出了很多出版品。特別是搬遷重建過程裡面，讓大家更看見我們的需要和努力，從繪本和出版品的呈現，給大家有更多不同的感動，孩子也覺得原來我們可以做這種事！做繪本，孩子是主要參與者，他們會發現自己也擁有這樣的能力。只是過去我們沒有這樣帶著他們，或者他們沒有這樣的經驗，就沒辦法想像，其實我們是可以的。（訪談部落參與者己，2014年7月9日）

在社區部分，因為學校的努力受到外界重視及協助，也反過來刺激學生家長思考，願意把孩子留在部落，共同協助文化與知識的傳承。

很多的資源，像是 xx 老師、甚至總統夫人對我們那種關心，我會覺得這是一段長時間、老師們共同的努力，所營造出來的一個學校特色。所以，也許有些家長希望他的孩子在原住民部落，畢竟我們都是同一個族群，可能在這樣一個學習環境當中，可以讓這些生活在一般地區的原住民孩子，可以在他們的生活經驗當中，慢慢喚醒一些他們已經遺失的部落經驗，跟可能要在部落才能學習到的傳統知識。（訪談部落參與者己，2009 年 9 月 17 日）

泰武國小與部落家長，在遷校過程中雖有衝突，但共同經歷災後重建後，反而可以相互理解。搬遷到永久屋，雙方互動更加密切，學校成為伴隨社區發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社區居民願意參與、協助學校事務，學校舉辦活動，提供空間給社區參與，也帶動社區活力。

我可以百分之百說：社區以我們為榮，非常相信學校。學校志工愈來愈多，每天早上的導護媽媽，就是大家輪流。導護媽媽，一天兩個，五天十個。學校辦幼兒園的老幼共學，部落老人進來幼稚園當老師，一個禮拜兩天。只要學校要求什麼，社區都不會拒絕。（訪談部落參與者乙，2014 年 7 月 10 日）

部落與學校搬遷到永久屋，受到各界關注很多，鄉公所也會很用心經營部落產業。部落在做空間規劃時，也設咖啡產業的行銷中心，經營者是部落的人。這在部落是很不一樣的改變，開始有人在做，而且做得不錯。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而且，學校石板屋也開放給家長會，做咖啡行銷。把校園空間活化，我們也是受惠者。空間使用不受限制，外來訪客也可從那個地方認識學校、認識部落。（訪談部落參與者己，2014 年 7 月 9 日）

因此，泰武重建經驗顯示，災區學校和重建部落可以攜手合作，透過個人自覺之後，形成社區的集體意識和行動力，在人力和資源上相互協助，推動社區共同利益。泰武經驗指出，部落內部並非均質組

成，參與動能及賦權，係以學校為核心向社區擴散，由具有自覺與行動力的菁英開始向平民擴散，也就是說，部落菁英及教育單位，應可作為社區發展的重要行動者。一方面，這些菁英如何對外爭取資源、善於與外界合作，另一方面，如何將合作成果轉化成社區共享的利益，而非如有些社區發展的結果成為少數人士把持的利益，除了菁英本身的自覺以外，有賴部落擴大參與、共同承擔發展的責任。

二、T 大參與者賦權

參與計畫的學生，展現對於災區記錄的熱忱和承諾，從修課、田野、報導以至於出版，全程參加。學生習得不同於其他課堂的田野調查經驗，加強採寫技能與應變能力，也能思考新聞相關倫理議題，甚至反思主流媒體與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參與賦權的影響，涵蓋個人技能、對制度的反思，以及實踐對於既有教育引發的啟示。

（一）個人賦權

學生在實務訓練中，學習採訪寫作的技巧，體驗記者工作的挑戰。例如師生在課堂上討論了田野訪問的原則，也針對採訪對象擬了不同問題，但是實際進入田野，面對受訪者的各式反應，可能是突然消失蹤影、訪談中情緒崩潰、與部落耆老溝通上的困難等等，因此訓練隨機應變的能力。

到這麼遠的地方做田野訪談，我覺得跟其他新聞所學到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可掌握相對地低很多，你必須在事前做更多準備或更多的假設，就讓自己更有彈性嘛。你不管在當下處理更多東西，或是更多的調配，譬如說你這個受訪者，你的時間那麼少，但是受訪者突然沒辦法出現的時候，你要怎麼去調配你的時間，或是讓自己的時間不要被浪費掉？這是在台北跑東西沒辦法遇到的，那這個經驗也讓自己的反應變更好一點。（訪談 T 大學生 A，2013 年 10 月 29 日）

要採訪的內容太多了，又有交通上的限制，因此有許多得靠觀察的寫作方向比較沒辦法做得盡善盡美；訪談也會因為語

言的限制，而遇到挫折，比方說木雕師 vuvu 不太會說國語，他的太太能夠溝通的話語也是有限，會覺得 vuvu 一定還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卻沒辦法記錄，相當可惜。

我覺得田野最重要的是要事先作功課，尤其是資料不多時該怎麼樣在短時間內取得想要的資料。所以如果先做足了功課，也把寫作的目標訂出來，在取得資料時會比較容易也不會花太多時間離題。（書面訪談 T 大學生 B，2013 年 10 月 29 日）

田野的訓練，讓學生實際體驗採寫現場可能面臨的狀況，也養成多工的能力。等到職場的工作後，更能適應環境，不至於產生太大落差。

對我幫助最大，就是技巧。譬如下去自己要身兼寫作、攝影、編輯，三個都有，那這個訓練讓我一到雜誌社，就很上手很習慣。就是說今天叫你訪某某活動、某某攤位、市集，戶外活動之類，那我就可以直接裝我的相機、直接過去拍跟訪，回到家寫，回來就可以生成又有圖、又有文，很豐富的文章。（訪談 T 大學生 C，2013 年 10 月 29 日）

除了基本寫作技巧與田野現場的體驗，學生們更能深刻體會設身處地的同理心。這是採寫技能之外，新聞工作者該有的良知良能與心理準備。參與計畫的學生，進一步選擇以泰武災後重建作為論文主題，更可見其對於面對與思索災區議題的承諾，並深刻省思報導者與弱勢者的關係。

作為新聞報導寫作者，我並不想跨越界線，成為事件的圈內人。但是，與當地接觸越深，我越不自覺地站在他們的角度看事件。這樣的涉入，不是要成為事件中任何人的份子，作為拉近關係的工具，更不是要為他們決定任何事。我只是認為，付諸更多的同理心，才能感受更多需要，才能知道「為什麼」。（查慧瑛，2011b：110）

專書寫作的經驗，讓學生對其新聞專業產生信心，實際進入職場工作，也能反思工作中所面臨的困境，對於自身專業與職場文化有更多省思。

這樣單純且長時間的紀錄報導，離實際的工作環境還有很大的差距，在工作中我也常會想起和同學們一起去採訪的樂趣，也會思考學校與現實工作經驗的落差到底是來自於自身專業不足還是職場文化的影響。我覺得大武山的歌聲中有許多專業的佳作，未來若碰到職場的前輩對這些學生作品有所存疑，也不必太懷疑是否是自己的專業能力不足，因為那完全是不同的典範。（書面訪談 T 大學生 B，2013 年 10 月 29 日）

（二）集體賦權

參與災難記錄，讓學生不只具備面對問題的心智以及深度報導、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更進而從制度面思考，災區記錄的價值以及與主流媒體的差異：災區記錄打破淺碟型的報導，甚至是記者與採訪對象的主客觀位置，長期報導與互動，可以陪伴弱勢者成長。

以那段經驗來看記者或新聞的行業的話，我覺得記者跟新聞這個行業，基本上應該要陪他們一起成長，陪那些居民一起成長，我是去作紋手、佳興那邊的，去訪問其他的男人……那他們有時候也不會想到說這個文化是這麼特別的，或者現在好像紋手 vuvu 已經慢慢要走了，他們才會試著去學習思考那些事情，有時候也會講到遷村或在山上你們會不會想要搬走這樣等等問題，好像我們也是帶進來去思考的，可是我覺得像這樣跟他們一起成長的，好像就不是主流媒體可以做得到的。（訪談 T 大學生 D，2013 年 10 月 29 日）

我所負責的部分是撰寫人物與文化保存的部分……，不論是事前的準備或是與其他同學共同去採訪新村落的工地，都明

顯感受到我們的計畫是很著重後續發展和權利、權力運作的記錄，這與一般媒體僅是報導災難畫面或是只著重於數據顯示這類淺薄的記錄有很大的差異。（書面訪談 T 大學生 B，2013 年 10 月 29 日）

新聞工作者也常常會面對一種反思，面對弱勢者，到底是採旁觀者的記錄角色，還是直接介入幫助造成改變？參與學生自問，記錄工作並非實質從事家園重建，是否因此失去價值？從長期角度而言，留下記錄讓社會理解，就是一種改變，也是一種價值。

我們是旁觀者，不是參與者，那我覺得旁觀者造成的改變，並不比參與者來的少，我覺得我們像是循體制內的管道去做一些事情，那他們是去衝撞，可是我覺得這兩者沒有優沒有劣，沒有價值評斷，我們做出來的成果沒有比他們差。因為當初看到那些人的做法，會讓你自己覺得說，是不是做太少了，有這種自我的懷疑。可是當訪問楊力州的時候，^[5] 就會想說我也是有留下這些照片、這些報導。（訪談 T 大學生 C，2013 年 10 月 29 日）

T 大學生由於就學年限的限制，完成計畫後多數已經畢業，進入職場。他們對於新聞職場的反思，雖還不到可以採取行動改變組織或整體社群現狀的程度，但是，這些反思應可對其從業工作提供深刻的提醒，避免落入新聞界被批評的慣習中而不自知。

而對於 T 大研究所而言，參與的老師、實務工作者以及仍舊在學學的學生，累積了災難記錄的經驗，隔年繼續進行另一個排灣部落的災難記錄，出版第二本災區專書。而 T 大研究所累積原住民研究的人力與能力，於 2012 年設置原住民族傳播與文化研究中心，更制度性地進行原住民族相關研究。此為組織層面賦權的例證。

誠如 Zimmerman（2000）所言，參與賦權是一種個人到集體改變的過程和結果。但是，本研究也發現，由於個人的身分並非一成不變，因此個人的生命階段和所屬社群或集體，也處在變動階段。過往賦權研究多分析單一個案或計畫中，參與者所造成的改變，對於參與者在計畫結束之後的改變則甚少著墨。本研究的參與群體之一為學

生，學生參與計畫時所在的組織為 T 大研究所，畢業之後則進入新聞職場，因此，在省思其參與經驗與影響時，能夠同時對兩個組織及社群提出反思。也因此，未來賦權研究應可將個人生命變動及跨越不同社群之間納入研究觀察與考量。

三、跨文化認知與包容

跨文化傳播文獻指出，因為文化情境、語言差異、思想型態等差異，不同文化之間的群體，對於別的群體存在刻板印象或偏見（陳國明，2003；Li & Patel, 2011）。解決之道在於顧及雙方需求，發展出一套相互同意與互利的方法，適度地解決問題（陳國明，2003：364-365）。更具體地說，跨文化協商中，解說和翻譯十分重要，可協助雙方彼此瞭解。此外，尊重個人及文化的獨特性，在跨文化互動中非常重要（Li & Patel, 2011: 16-17）。良好的跨文化互動，最終方能增進瞭解、創造雙方利益。

屏東排灣部落災區民眾和台北都會漢人學子，原本屬於兩個不同世界的群體，卻因為災後重建記錄相遇。跨部門、跨族群的合作經驗，讓雙方有更多對話與理解，能夠相互欣賞、瞭解與學習，打破刻板印象與文化差異的藩籬。

對於部落參與者而言，與 T 大團隊師生合作進行災區記錄，依據各自專長進行分工，不只是為了完成一個計畫，記錄者與口述者之間的對話，更是跨文化間的對話與理解。跨文化傳播研究所指的翻譯者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得到印證。部落的文史工作者通常扮演此角色，透過翻譯及解說，部落文化得以正確傳達給外來者，才能真正增進瞭解，不致誤會。

我們可以把文化說給你們聽，可是那個文字化檔案化我們不會。因為那個編排不是我們的專業，可是說故事是我們的專業。所以比如說像我們現在，你聽得津津有味，你寫的時候就會把它寫出來，可是你叫我寫我大概就會想說，這個很重要，我會用我的邏輯思維去寫，可能我自己看得很有道理，可是大家都看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呢？你會有很多的問題，這個就是說我們來做口述者，你們來做記錄者，就是因為要

克服我們雙方的文化落差。（訪談部落參與者甲，2010年8月26日）

在計畫過程中與 T 大團隊有很多互動的排灣木雕師丁，常常對師生講述排灣文化傳統與故事，也分享他的木雕創作意念，每一次對話都是原漢之間的文化交流。回顧與漢人學生的互動，木雕師以相互學習、開放心態來面對，消弭不同文化之間的刻板印象。

相互學習一定是有的。對於漢人學生來講，原住民文化是新的。刻板印象一定有的，就像我去外面，去布農族、泰雅族的環境，也會有刻板印象啊。學生來這邊，是要學習的。能分享給你們的東西，越多越好啊。我抱著比較開放的心態，學生的需求和目的是什麼，能對你們產生一些影響。（訪談部落參與者丁，2014年7月10日）

刻板印象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議題，傳播研究中也常指出弱勢族群被強勢族群及媒體塑造刻板印象的現象（王嵩音，1998；黃威葳，1995），在本研究的原漢互動中，處處可見刻板印象的運作與省思。認識原住民文化的經驗，讓漢人學生改變原來對原住民族社會的理解，並反思媒體呈現的刻板印象造成的影響，印證良好的跨文化互動可消弭刻板印象的假設，除了透過互動正確認識其他文化的面貌與內涵，甚至能反思自己文化不足之處。本研究中，漢人學生從原住民文化反思自身文化，體認到漢人文化的問題。漢人學生體認到都會青年，通常是冷感、冷漠的，但是原住民青年的凝聚力高，並積極組織，改變部落現狀。

透過一些主流媒體看他們的時候，我們可能對原住民族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但是我覺得對我印象衝擊最大的是，其實原住民族，他們對於自己族群的認識，還有凝聚力是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很多的。……像我們現在的社會裡面，青年對於整個社會都是很冷感、冷漠的，但是我所看到青年原住民朋友，對於它們的付出、就是很像要去做一些改變，我覺得是一般台灣普遍青年都做不到的，譬如說他們會去組青年

團、進修，或是去組一些組織，去改變部落的現狀，讓部落變得更好。（訪談 T 大學生 A，2013 年 10 月 29 日）

參與學生原本從媒體中認知的原住民社會，是頭目制度傳承的權力，但是實際進入部落後，發現部落內部的權力結構比刻板印象中更加複雜。從事記者工作之後，也意識到對於不熟悉的文化 and 事務，應抱持開放態度，不致被成見蒙蔽。

譬如說頭目在部落裡面就是決策力很大，就是有一種想像，就是當地就是比較封閉的團體，會取決於頭目的決定去做很多的行動，可是下鄉之後才發現，當地還有所謂的鄉公所、文化組織這些人，再加上頭目的勢力現在已經慢慢不被重視了，那這個當然跟現實間有很大的落差。這中間我學到的是，對一件事情，還沒有完全去接觸到它，實際採訪跟報導之前，可能先不要有一個定論，要用比較開放的態度比較好，就算事前有蒐集到一些資料，對資料也是抱持半信半疑的態度較好。對於你產生報導的助益比較大，比較不會被成見扯後腿的感覺，比較多發揮空間。（訪談 T 大學生 C，2013 年 10 月 29 日）

值得注意的是，T 大學生長期投入災區記錄，與災區學校、居民互動，嘗試理解，原漢之間的藩籬因此漸漸消除，甚至從外人到被視為部落的一份子。這種從「他群」到「我群」的認定，已經超越了跨文化傳播所談的相互尊重與理解，應該可解釋為外來者已經跨越自身文化框架，進入另一個文化而被認可為該社群內部一分子。這種跨越文化的身分轉換，對於跨文化傳播的意義，值得注意。

他們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一份子，他們就是部落的一份子。雖然外表白白的，但我覺得他們就是部落的人。他們離開後，一開始我們還覺得失落，因為他們在，可以負責照相，文筆又好，可以直接交給他們。（訪談部落參與者己，2014 年 7 月 9 日）

柒、結論與檢討

本文回顧屏東泰武災難記錄計畫，指出計畫以部落參與、服務部落利益為原則，奠基於社區媒介的重要意理。透過數位典藏及專書出版，記錄災後重建，可彌補主流媒體資訊真空的缺憾，也發揮新聞教育的社會實踐。更重要的是，災後重建記錄不只是書寫的成果，也是參與者培訓賦權的過程。計畫組成跨族群、跨部門團隊，透過課程培訓、田野調查及報導出版，建構災區重建數位典藏記錄，留下以原住民災民為主體的珍貴重建資料。

本研究在分析視野上，超越既有文獻之處在於：(1) 將社區傳播的分析面向擴大，不只分析社區內部的參與及改變，也強調外部協力者的角色，因此引入跨部門合作的文獻進行分析；(2) 既有的跨部門合作，多強調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作過程，本研究將文化因素引入，結合跨文化傳播的論述分析此一跨部門、跨族群的災區記錄計畫。

從這個跨族群、跨部門合作災難記錄的經驗中，可見記錄報導或文化典藏，必須因應社區主體的需要，貼近部落居民的生活，才符合社區媒介的真義。T 大團隊和泰武部落的合作，從文化典藏轉型到災後重建記錄，讓典藏內容更加契合部落生活經驗，因此也擴大了部落的參與動能。因為受災、遷村的議題，牽動部落的敏感神經，涉及族人的去留問題，每個人都有話要說，也期待自己的意見被聽到、受重視，因此重建過程中的故事與心聲得以被記載下來，豐富了記錄的內容與價值。

跨部門分工合作，彌補單一團體資源不足的困境。例如，T 大團隊有採寫與記錄專業，但是欠缺對排灣文化的瞭解與部落人際網絡；部落文史工作者與藝術家有豐富的在地知識，但是缺乏物質資源協助；泰武國小處在遷校風暴中，卻缺乏發聲管道等等。因此，分工合作之下發揮截長補短之功能，而且透過溝通與合作，增進跨文化接觸與學習。部落的參與，更彰顯原住民主體的傳播權，凝聚社區意識。

然而，跨部門合作也有諸多挑戰，例如不同部門有其工作文化與部門常規，必須在工作過程中不斷折衝與協調；不同部門、族群之間也必須建立互信，而互信之培養需要時間與許多經驗累積。本研究也發現，原住民部落過往與外來漢人團隊合作，產生不愉快與剝奪感，因此一開始對於外來團隊傾向抱持懷疑態度，更增加合作難度。合作

計畫如何尋求雙方利益，或者提供實質回饋，相對變得重要。在此，實質回饋並非指金錢或物質利益，而是能夠有助於社區與部落利益的事物，例如出版專書留下記錄。

計畫在多年努力後，與部落藝術家、文史工作者及學校建立互信，然而也不免觸及部落內部既有的矛盾，以及因為風災之後產生的衝突，還有部落因為面對遷村的急迫問題而自顧不暇等等，這些情形也考驗外來團體如何保持敏感度與開放態度，理解並因應部落參與者的不同狀況。

以災民為主體的重建報導，期待召喚多數部落民眾參與，然而部落處在災後的動盪中，居民面對生存問題分身乏術。部落成員或組織之間存在權力與能力落差、資訊落差，也造成參與動能的落差。計畫在部落內部動員能量不足的情形下，曾造成記錄工作停滯，也因此改變分工模式。由此可見，弱勢社區的參與動能並非一蹴可幾，需要更多的時間以及在地經營。從災區參與經驗來看，相對於學校的高度動能，社區居民參與有限，因此如何有效促成社區參與，仍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跨部門合作本身，對於不同部門的參與者而言，都是學習與賦權的重要過程。也因為合作參與、學習及行動，產生賦權的結果。透過參與賦權理論的視野，研究發現，災後記錄的參與者，透過參與而學習，有助於提升個人能力，增進族群認同，反思及促進所屬社群的利益，也慢慢累積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條件。

從在地社群的角度而言，災區記錄計畫，得以讓部落居民近用傳播工具，表達意見，成為災後重建的行動主體；部落的參與者透過培訓增加傳播技能，強化社群認同，因為參與記錄部落文化，增加年輕學子與部落耆老的互動，加深認識排灣文化及其價值；與外來團隊的合作，使得部落人士建立更多網絡，能夠善用外界資源協助其重建，持續進行文化傳承與社區營造。此符合社區媒介作為社區參與、賦權平台之論述（Fuller, 2007）。

從 T 大學生的角度，透過培訓習得不同於其他課堂的田調經驗，看到台北都會區以外的部落社會，也能思考新聞相關倫理議題，學習如何面對受訪者及文化差異，最終，進而反思主流媒體與新聞工作者的角色。T 大研究所累積災難記錄經驗與能力，持續出版災區記錄，並且設置原住民族傳播研究中心，展現組織賦權的影響。

可貴的是，原漢之間的合作，增進相互的瞭解與信任。跨部門、跨族群的合作經驗，讓雙方有更多對話與理解，能夠相互欣賞、瞭解與學習，打破空間與文化的藩籬。部落參與者分享其文化精神，也因為外來者的支持和合作，更有信心面對自身的文化傳承。台北的漢人學生，透過直接互動，學習排灣文化及原住民與自然共存的價值，不只改變原本對原住民族社會的理解，並反思媒體呈現的刻板印象造成的影響。

而且，災區記錄計畫的原漢互動，係由漢人學生進入原住民部落，理解並學習原住民文化與其生活處境，一方面，在記錄計畫中漢人似乎是幫助者，原住民是受益者；但是，在文化認識上，漢人是學習者，原住民是傳授者。雙方的關係，並非一般定義下的漢人強勢文化與原住民弱勢文化的分野，強勢弱勢關係在不同情境下處於動態變動中。作為學習者的漢人學生，反而更需要謙虛求教，並透過原住民文化反思自身文化，因此，漢人也成為學習者，原漢權力關係因而翻轉。

此計畫針對災難記錄所規劃的培訓課程，在 T 大研究所和泰武國小，取得相當進展與成果。然而，台北都會與屏東原鄉畢竟有遙遠的空間上的阻隔，遠距的培訓課程若能技術移轉至原鄉，由在地的學校主導，培育原鄉學童數位能力與記錄方法，持續操作與實踐，相信更能有效提升原鄉文化與傳播權益。此點確實也再次彰顯城鄉資源不均、新聞傳播科系多數在台北都會的結構困境。

雖然難以尋覓在地的傳播科系持續與部落合作培力，然而泰武國小作為在地主要的教育機構，在災後展現了高度的能動性，運用災後與外來團隊合作的機會，培訓學生影音記錄、外語、才藝等等能力。外來團隊離開後，學校持續培訓學生，原本的數位典藏記錄經驗，學校將之轉化成經營臉書，記錄以古謠隊為主的學校與社區動態，聯繫部落內外的社群。災區記錄書籍出版結束，學校則培訓學生認識排灣文化、對外介紹學校與部落的能力，並出版繪本等專書。即使傳播的媒介轉變，在地自主的力量更形茁壯。

最後，災後重建記錄的即時新聞，不限於在部落數位典藏網站上公開，也嘗試透過多媒體、多管道進行，露出平台包括 PeoPo 平台和莫拉克獨立新聞網，這些平台已經有固定使用者與瀏覽人次，因此推廣與互動效果更好。透過網站，部落資訊不只在部落內部流通，更易於讓外界關心者得知，產生連結與互動。然而，原住民部落處於數位

落差的劣勢端，嫻熟網路素養的民眾畢竟為少數，因此產生部落內部資訊流通的不均等，以及資訊權力的落差；而部落資訊在網路蒼茫大海中，也有佚失的風險。

而書籍出版的形式，因應部落族人的期待與要求，正好彌補網路之不足。紙本媒介，讓數位內容有了物質依附，永久保存，也讓部落裡不熟悉電腦網路的人士，有機會認識典藏內容與價值。然而，不可否認，漢文書寫的形式，並非部落族人原有的溝通方式，是否增加漢人文化強加於部落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也值得注意。

過往對於原住民部落的傳播研究指出，部落的傳播方式與工具，必須要考量部落內部既有的傳播形式、社會制度與權力等（林福岳，2011；高曉佩，2009）。原住民部落特殊的條件，使得部落媒介的發展不同於其他社區媒介。因此，從傳播工具的角度而言，如何掌握並善用不同媒體的特性，選擇符合在地現實與需求的傳播工具，值得未來從事災難記錄、部落傳播或是數位典藏推廣工作者深思。而本研究將焦點置放於跨部門合作與賦權的角度，兼顧原漢族群參與者的合作過程及改變，也因此無法深入探討部落的社會情境、權力結構與媒介近用的關聯。本研究點出此分析角度的限制，也建議後來者可以深入探討之。

註釋

- [1] 關於泰武鄉佳興村、泰武村簡介，可參照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tribe/tribe_detail3.aspx?id=20070506000177，或屏東縣泰武鄉公所網站 <http://www.pthg.gov.tw/TownTto/CP.aspx?s=2155&cp=1&n=12706>
- [2] 關於泰武國小災後遷校歷程，可參見洪貞玲主編（2011）《大武山的歌聲》一書。
- [3] 計畫隸屬於「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之推廣分項」中之第三子計畫「人文與社會發展計畫」。
- [4] vuvu 為排灣族人對於長者的稱呼。
- [5] 楊力州導演的紀錄片《拔一條河》，記錄高雄甲仙國小拔河隊的故事，彰顯八八風災後災民和困境拔河的鬥志。

參考書目

- 王嵩音(1998)。《台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台北市：時英。
-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3)。〈統計概覽〉。上網日期：2013年7月10日，取自 <http://88flood.www.gov.tw/work.php#1>
- 林照真(2013)。〈台灣電視新聞之災難報導：以「莫拉克」風災為例〉，《新聞學研究》，115：141-185。
- 林福岳(2011)。〈原住民部落自主傳播的媒介試驗：花蓮縣福音(Lohok)部落「村長麥克風」計畫〉，《傳播研究與實踐》，1：149-177。
- 查慧瑛(2011a)。〈泰武小記者為部落寫故事〉，洪貞玲(編)《大武山的歌聲》，頁40-45。台北市：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屏東縣泰武國小。
- 查慧瑛(2011b)。《唱山謠、悵山謠——泰武國小的莫拉克重建路》。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貞玲主編(2011)。《大武山的歌聲》。台北市：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屏東縣泰武國小。
- 洪貞玲(2012)。〈原住民數位典藏與在地力量：以佳興部落文化保存為例〉，《原住民文化傳播學刊》，2：22-39。
- 孫曼蘋(2001.01)。〈參與者？中立者？社區媒介與社區關係之探討——以南投縣埔里鎮社區報《希望·埔里》為例〉，「傳播社群與社會整合研討會」論文。台灣，台北。
- 孫曼蘋(2011)。〈在地發聲、媒介素養與社區行動——彰化縣員林鎮《員林鄉親報》之個案研究〉，《新聞學研究》，108：59-102。
- 高曉佩(2009)。《「部落傳播」概念之建構與實踐——以花蓮lohok福音部落「村長麥克風計畫」》。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梁玉芳(2011)。〈以記錄抗拒遺忘〉，洪貞玲(編)《大武山的歌聲》，頁186-187。台北市：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屏東縣泰武國小。
- 郭恆成(2011)。《黑色流金原鄉契機——泰武咖啡產業的現況與未

- 來》。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佳君、陳寧、林巧璉、蔡紀眉（2010.07）。〈台灣報紙災難事件新聞報導研究——以四大報之八八水災新聞為例〉，「2010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第四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嘉義。
- 陳國明（2003）。《文化間傳播》。台北市：五南。
- 陳清河（2004）。〈科技、政治與弱勢傳播：以台灣原住民族之廣電媒體近用為例〉，《台灣民主季刊》，1：109-138。
- 黃葳葳（1995）。〈回歸本土乎？有線電視與偏遠地區民眾〉，《廣播與電視》，2：167-209。
- 臧國仁、鍾蔚文（2000）。〈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新聞學研究》，62：143-151。
- 劉幼琍（1998）。〈原住民對廣電媒體使用與滿足之調查分析〉，《廣播與電視》，2：167-209。
- 蔡鶯鶯（2010）。〈921地震災後的社區報紙與培力〉，《新聞學研究》，102：177-227。
- 羅秀華（2003）。《文山社區由充權到治理的發展歷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蘇蘅（2000）。〈集集大地震中媒體危機處理的總體檢〉，《新聞學研究》，62：153-163。
- 鐘嘉順（2008）。《我們是誰？我們自己述說——原住民族電視台中原住民新聞報導之內容分析》。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Adams, R. (1996). *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abiak, K., & Thibault, L. (2009). Challenges in multiple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8, 117-143.
- Berrigan, F. J. (1979).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media in development*. Paris: UNESCO.
- Brown, L. D., & Ashman, D. (1996). Particip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sectoral problem-solving: African and Asian cases. *World Development*, 24, 1467-1479.
- CRIS (2002). What i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community media to civil society? CRIS Campaign Issue Paper 3. *Media Development* 2002/4.

- Retrieved July 30, 2013, from <http://man.comunica.org/archives/45>
- Fuller, L. (Ed.). (2007). *Community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arding, A. P. (1990).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urban regeneration. In M. Campbell (Ed.), *Local economic policy* (pp. 108-127). London: Cassell.
- Hollander, E., & Stapper, J. (1992). Community media an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N. Jankowski, O. Prehn, & J. Stappers (Eds.), *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 (pp. 16-26). London: John Libbey.
- Hollings, J. (2010). Reporting the 2004 Tsunami: Media, ethics, and the aftermath of a disaster. In Fuller, L. K. (Ed.), *Tsunami communication: (Inter) personal/intercultural, media, technical, ethical, philanthropic,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responses* (pp. 223-239).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Li, M., & Patel, F. (2011). Overview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F. Patel, M. Li., & P. Sooknanan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pp. 15-38). London: Sage.
- Maslog, C. C., Navarro, R. L., Tabing, L. N., & Teodoro, L. V. (Eds.). (1997). *Communication for people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UNESCO-TAMBULI.
- Narayan, D. (Ed.). (2005). *Measuring Empowermen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gra, D. (Ed.). (2010). *Old and new media after Katr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Patel, F., Li, M., & Sooknanan, P. (2011). Culture, gender and race. In F. Patel, M. Li, & P. Sooknanan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pp. 174-180). London: Sage.
- Perkins, J., & Izard, R. (2010).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Lessons learned. In R. Izard, & J. Perkins (Eds.), *Covering disaster: Lessons from media coverage of Katrina and Rita* (pp. 1-18).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 Samovar, L. A., & Porter, R. E. (2004).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Tufte, T., & Mefalopulos, P. (2009).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 practical guid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ndolleck, J. M., & Yaffee, S. L. (2000). *Making collaboration work: Lessons from innovation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Zimmerman, M. A. (2000). Empowerment theory: 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of analysis. In J. Rappaport & E. Seidman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Covering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an Indigenous Village: Cross-Ethnicity and Cross-Sector Cooperation and Empowerment

Chen-Ling Hung*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ed a news coverage project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Taiwu, Pingtung County, after Typhoon Morakot. The project is conducted through cross-ethnic and cross-sector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pei and the residents of Taiwu.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residents, the students produce news storie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the victims to share their disaster experiences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 thus filling the gap in re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rough mainstream media. B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project participants learn in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The outcomes of learning and empowerment include the enhancement of capabilities, enforcement of identity, increased empathy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for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Keyword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cross-sector cooperation, disaster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yphoon Morakot

*Chen-Ling Hung is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